



## 突破学科藩篱： 技术时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因应之道

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正走在激变的前夜。一方面，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国家的重大战略向人文社科研究提出了新命题和新挑战；另一方面，人文社科研究和评价的学科化、数目字化、内卷化问题依然突出，甚至有加剧的趋势。2019年《探索与争鸣》杂志开设“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专栏，追踪、聚焦和探讨中国知识体系建设中的新问题、新情况，引发了学界广泛的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如何尊重学术规律，突破学科藩篱，生产出真正有生命力的思想和学术，如何有效介入时代重大命题，回应时代关切，成为摆在中国人文社科研究者面前的重大议题。为此，《探索与争鸣》编辑部与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共同组织召开了“人文社科研究如何突破学科藩篱，切中现实问题”圆桌会议，与会专家展开了热烈讨论，取得了丰硕的讨论成果，本次圆桌会议将择要集中展示研讨会部分人文学者对技术时代中国人文学术发展的相关思考。

郁振华教授对技术时代的人文学术发展进行了探讨，认为协调学科和跨学科的关系、体和用的关系、认知和评价的关系极为重要，与排行榜相比，人文学者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来自未来的历史评价。朱国华教授认为当今中国在部分科技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人文学科跟西方的整体水平还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如果认识不到这一点，则会是人文学科最大的危机。成伯清教授认为当前中国人文社科学界普遍存在着学术的悬浮化，根本原因在于制度性隔离、专业内卷化和碎片化以及文化上的无根。要想走出这种状态，就要让支撑和维持社会架构的基础性制度及其运作过程更加开放和透明，充分发扬学术的反思精神和自我批判意识，强化学术共同体的自觉意识。邹诗鹏教授指出，学科的过度细分及学科体系的庞杂倾向，导致学术研究呈现碎片化、虚假化、内卷化问题，既涉及科层化及合理化，也涉及经年形成的惯性及不断增加的利益因素，对此不宜施行激进式的改革，应在不改变基本价值观的前提下，在制度安排及组织措施上做文章。杨扬教授结合艺术院校学科评估实践，分析了学科评估带来的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一些具有自身办学传统和办学特色的院校可能为了追求评估指标排行而削弱乃至放弃自身的特色，以及评估指标体系的误置加剧了艺术学科劣币驱逐良币效应，可能导致国家教育政策误判。他提出应兼顾国家政策调整和教育事业的内在需求，寻求学科评估和学科发展某种真正有效的平衡点。孙向晨教授指出学术研究有自身的发展规律，我们应该尊重学科发展的规律，给大学创新提供更大的空间，减少人为干扰与影响。郑戈教授指出，理顺科研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改变以自然科学学术评价为模板的单一化评价标准，发展出适应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特点的评价机制，是使中国学术具有更全面竞争力的制度性前提。

——主持人 叶祝弟 张 蕾

## 人文学术如何迎接技术时代

郁振华，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探究活动都由问题引发，人文研究也不例外。学科是某一领域以往探究成果的系统总结，具有体系性，是大学学术建制的基本单位。新问题的涌现，有时发生在学科内，有时越出了学科的范围。无论是从事学科建设，还是致力于跨学科研究，学者都旨在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换言之，对于人文学术的发展来说，具有优先性的是问题及其解决，学科或跨学科是第二位的。从这样一个视角出发，笔者对当今人文学术的发展，提出三方面的观察。

### 技术时代的人文学术

近代以来，科学的技术应用彻底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世界。随着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人类生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为技术所裹挟、所形塑。这是我们今日讨论人文学科的发展时，首先要面对的现实。

人文学科该如何直面日新月异的技术呢？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兴起和发展，给了我们积极的启示。数字人文是人文学科和数字技术结合的产物，<sup>①</sup>是典型的跨学科领域。数字人文的前身是人文计算，其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末。70年来，这一领域中出现了一些引人瞩目的成果：如意大利哲学家、神学家Roberto Busa主持的“托马斯著作索引”项目（Index Thomisticus，即中世纪经院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著作索引）；以郝若贝教授（Robert M. Hartwell）为先驱的哈佛大学“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项目；北京大学中文系李铎博士主持的“全唐诗分析系统”“全宋诗分析系统”；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教授主持开发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等等。GIS（地理信息系统）应用于中外历史研究而产生的各种HGIS（历史地理信息系统），也是数字人文的重要成果。相对于传统人文学术，数字人文运用

数字技术，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生发了新的问题意识，揭示了新的意义关联。一些别开生面的研究成果，对于人文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近年来，国内数字人文研究发展迅猛。围绕着数字人文，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



等高校已召开了多个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武汉大学成立了国内首个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大数据视域下的数字人文研究”入选2018年中国十大学术热点。

技术时代的人文学术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技术批判。哈贝马斯着眼于知识和兴趣的关系，将人类知识分为三类：经验—分析的科学拥有技术的兴趣，旨在实现对客观过程的技术控制；历史—诠释学的科学拥有实践的兴趣，旨在促进行动导向的主体间相互理解，这种意义理解以达成可能的共识为目标；批判取向的科学，如意识形态批判和心理分析，拥有解放的兴趣，旨在通过主体的自我反思，来摆脱依赖关系。人文学科涵盖了后两方面的知识和兴趣。在技术时代，对技术异化的批判显得尤为迫切。人们发明和改进技术，是为了增进人类福祉。技术异化却使技术变成一种异己的力量，它戕害人性，阻碍人的全面发展，甚至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从道家“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

① 郭英剑：《数字人文：概念、历史、现状及其在文学研究中的应用》，《江海学刊》2018年第3期。



微信公众号

Apr. 2019

5





事者必有机心”的论断(《庄子·天地篇》),到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座架”(Ge-stell/enframing)本质的揭示,古今中外的人文学者,一直对技术异化怀有高度的警惕。如今,基因技术和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改变人类的生活,在给我们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把人类带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之中,人类生活的一些基本预设受到质疑,人性的概念面临挑战。以倡导人文理想、弘扬人类价值、捍卫人类尊严为本务的人文学科,应该深度介入由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所引发的有关人类未来的争论之中。在这一方面,德莱弗斯<sup>①</sup>和哈贝马斯<sup>②</sup>的工作堪称范例。这场事关人类未来的大争论,必然是一项跨学科的事业,需要多重专长的介入。一方面,人文学者要与科技工作者积极互动,了解科学技术的最新进展;另一方面,人文学者要充分发挥自己的学术专长,批判技术异化,以正确的价值观来规范技术的发展。

总之,我们既要热情拥抱数字技术,实现从传统人文向数字人文的转型,又要对技术异化有充分的警惕,积极展开技术批判,这是技术时代人文学科发展的两项突出任务。做好数字人文和技术批判,都要求我们冲破学科藩篱,进行跨学科的探索。

### 人文学科建设的体和用

在重视跨学科的同时,还须强调的是,跨学科的基础是学科。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学科建设被视为高校工作的重中之重。在此,值得一问的是,我们的学科建设做得如何?如何富有成效地进行学科建设?

面对国内外各类排行榜,学科建设

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围着各类指标体系转。在具体操作中,学科建设常常被还原为指标建设,变成一种乏味的数字游戏。在这个指标主义的游戏里,学术研究中那些激动人心的内容,如高远的学术理想、追求真理的热忱、探究过程中的痛苦和欢乐,等等,统统湮没不彰。对学科建设的这种理解无疑是褊狭的、简单化的,关键在于它忽视了学科建设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即学术传统建设。

认识论研究告诉我们,知识创新往往发生在传统深厚的地方。<sup>③</sup>道理其实不难理解:“水之积不厚,其负大舟也无功。……风之积也不厚,其负大翼也无功。”<sup>④</sup>覆杯水于堂中凹地,只能载一叶草芥;大鹏扶摇而上青天,是因为九万里风斯在下。传统深厚意味着积累深厚,深厚的积累之引发知识创新,犹如强劲的踏板助推运动健将腾跃飞翔。传统和创新的辩证法既适用于自然科学,也适用于人文科学,在此,我们关注的是后者。既然知识创新是学科建设的核心目标,那么,学术传统建设便是一个绕不开的课题。事实上,我们不少大学的人文学科,经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积累,形成了各自的学术传统。在这些传统中,优秀学者及其范例性成就所体现的学术理想和卓越标准,对于后学具有极强的感召力,为他们投身学术事业提供了持久的动力。因此,梳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使之活在当下并指向未来,当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在学科建设中强调学术传统的重要性不是要否认指标体系,因为我们反对的不是指标本身,而是指标主义。那么,学术传统和指标体系是什么关系呢?二者的关系类似于里子和面子、实质和形式的关系,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体和用的关系。从理论上说,体用不二,但在实践中,体用常被截成两橛。指标主义只见指标,不见其他,其弊就在于只见用而不见体。在学科建设中,学术传统为体,指标体系为用。称体起用,有了强劲的学术传统,指标体系自然水到渠成。这个道理启示我们,在学术传统建设上用力乃务本之举。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如何拥有传统?我们与传统的关系,可以是外在关系,也可以是内在关系。当传统只是一种谈资,与当下的事业无实质性关系时,拥有传统犹如拥有博物馆中的展品,此时,传统与我们

① Hubert Dreyfus: *What Computers Can't Do*, Harper & Row, 1972; *On the Internet*, Routledge, 2001.

② Jürgen Habermas: *The Future of Human Nature*, Polity Press, 2003.

③ 郁振华:《人类知识的默会维度》,第十二章,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④ 参见《庄子·逍遥游》。



的关系是外在的。内在关系有两种情况，或者是消极的，或者是积极的。当传统成为羁绊，令我们裹足不前时，拥有传统犹如处于牢笼之中。当然，我们也可以积极化用传统，使之成为我们解决当下问题的思想资源，一如在工作坊中，各种用具、材料上到手来。概言之，这里涉及拥有传统的三种方式：博物馆式的拥有、牢笼式的拥有和工作坊式的拥有。在学术传统建设中，牢笼式的拥有是需要克服的；博物馆式的拥有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工作坊式的拥有则是值得倡导的。上文强调了传统和创新的辩证法，不难看出，只有立足于传统的工作坊式的拥有，学术传统助推知识创新才是可能的。

### 人文学者的双重身份

无论是学科建设还是跨学科研究，主体都是人文学者。人文学者既是人文知识的生产者，也是人文知识的评价者。认知和评价是人文学者的两项基本工作。人文学科的健康发展，有赖于我们扮演好这两个角色。在职业生活中，我们一直在这两种身份中切换。认知者的身份大家关注得比较多，评价者的身份则关注得比较少。因此，笔者着重谈谈后一方面的问题。

人文学者对现有评价体系多有不满，但如陈平原教授所言，我们不能有“怨妇”情结，应该积极想办法，找出路。评价本身没有错——中肯的评价，不管是赞还是弹，都是积极的反馈，有助于人文学者提高工作品质。问题在于，目前流行的评价体系，对于人文学术不尽合理适切。能不能在多方努力下，设计出比较合理适切的指标体系？对于评价指标和规则的制定，一线的人文学者能不能有更多的参与？上文以体用说学术传统和指标体系之间的关系，若能将学术传统所包蕴的丰富内容考虑进去，在体用之间达成一种反思的平衡（称体起用、由用达体），那么，设计出一种比较合理适切的人文学科评价体系，应该是可以期待的。

人文学者既是评价的对象，也是评价的主体。作为评价对象，我们希望被公平对待，所以要求合理适切的评价标准。那么，作为评价主体，我们是否公平对待了评价对象？是否尽了自己的职责？比如，中外

惯例，学生升学需要教授的推荐信，招生单位希望通过教授的评价来了解考生的相关素质。我们是否认真写了每一封推荐信？平时，我们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参与各种类型、各个层次的同行评议。扪心自问，在每一次的评议中，我们是否本着学术良知给出了自己的判断？我们的判断是否达到了专业水准？

在更大的视域中，通过评价活动，我们甚至参与到一些当代学术作品经典化的过程之中。我们今日面对的各种人文经典，正是千百年来历史评价的结果。经典作品树立了何谓卓越的绝对标准。在此层次上观照历史，会有一种“删繁就简三秋树”的效应：将经典连缀起来，学术史的发展脉络便清晰可见。真所谓“大道至简”！这一层次的评价，全然脱去了今日各类排行榜的繁复琐细。本此见地，被此起彼伏的排行榜搞得心力交瘁的当代学人，焦虑或可稍减，因为未来世代的人们大概不会太在意我们今日在排行榜上的表现。但是，没有人能回避经典所体现的绝对标准。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今人按此标准来评价古人，后人也会以此标准来评价今人。对于人文学者而言，与排行榜相比，更大的压力其实来自如下问题：如何面对未来的历史学家？如何面对“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时不时地，常有人出来宣布人文学科的危机。对于已有二千五百多年历史的人文学术而言，这已不再新鲜。一代又一代的人文学者，以出色的工作证明了自己的不可或缺。作为一种探究活动，人文研究围绕着人类基本价值（如自由、正义、真理、善、美等）而展开。协调好学科和跨学科的关系、体和用的关系、认知和评价的关系，技术时代的人文学科将赢得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人文学科的危机，和其他领域的危机一样，是一个具有刺激性的、让人津津乐道的老话题。2010年，有位耶鲁大学的教授在JSTOR系统中键入“crisis in the humanities”，发现早在1922年就有数



篇文章讨论这一话题了。他还注意到，20世纪40、50、60年代，学界对人文学科状况的不满持续升温，甚至到了1964年，一本以此为书名的著作成了畅销书。但是，仿照网络时兴的语法，我们可以问一句：“当我们说起人文学科危机的时候，我们在说什么呢？”对于这一问题好像还没看到比较清晰的观点。我这里打算从四个方面就这个话题做出初步探讨。每次讨论的时候，采取的步骤都是先谈西方，再论中国，最后会提出我的个人看法。

首先，人文学科的危机表现为招生人数的萎缩，以及人文学科领域的教职岗位以及科研经费的削减。有位西方学者根据人文学科学生注册人数做了实证调查，发现实际上客观数据与主观感受稍有出入。1955年之后，随着师范学院纷纷变身为综合性大学，选择人文学科专业的学生一度攀升到17%左右的高位。但是20世纪70年代至1985年左右下降到了8%，之后这个数字再次

## 生存危机：人文学科如何对标当代中国

朱国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了10%左右的峰值，然后又回到了8%左右，直到2008年经济衰退时才降至6%。不管怎么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在研究型大学和精英文理学院三分天下的均衡态势是宣告终结了。近二十年来，文理学院的人文专业学生人数已经从三分之一下降到四分之一以下，研究型大学人数也下降到了原来的70%左右，而原本这两类性质的大学是人文学科的主要阵地。当然，西方大学的教师只要拿到终身教职，不必为生计发愁。但是，没有自己专业的学生，他们只好给其他专业的学生开通识课，寄人篱下的痛楚自然是不言而喻了。日本有些大学的做法是，令人文学科教授教职数量自然衰减，经费自然也会随之锐减。

这样的情况，其实在中国并未发生。中国的大学大众化过程，尚未停止。一些新兴的大学，尤其是民办大学，热衷于兴办成本较低的文科院系。与此同时，一流高校的文科招生人数，依然保持较高的水平。以2018年为例，北京大学的人文学部招生人数占比16.6%（不含元培班）；南京大学人文类学生总数为309人（含戏文专业），位居第四位；北师大文学院招生人数在各专业中位居第二。其实人数不一定能完全说明问题。笔者所在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最近七八年来中文系招生的分数稳居第一方阵，入学之后，极少发生中文系学生希望转系到其他专业的，但是其他专业学生希望通过转专业考试来就读中文系的，每年均超过百人。

第二，人文学科不再处于大学体制的统治地位。古代的教育，无论中外，就其范围、意义和对象而言，在性质上都接近人文学科。在古代西方，学校教授的课程为语法、修辞、逻辑和数学。其中数学这门学科又分为四个方面：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在这里，古典文化无可匹敌的优先地位得到了高度肯定。从文艺复兴到近世以来，人文学科构成了大学的灵魂。奠





定了现代大学理念基础的两位教育思想家——普鲁士的洪堡与英国的纽曼，都不约而同地鼓吹教育的非功利性或者说纯粹性。他们都认为教育的根本在于培养完善的个人，知识本身就是目的，所谓自由教育，应该是通过教育使人自由。科学知识甚至都是狭隘的，而实用知识不过将学生引向职业培训层次，这些都容易产生支离破碎的认识。纽曼认为神学可以提供知识的统一性，而洪堡认为哲学才能堪当此任。西方的大学在后来发展之中，文化，尤其是文学艺术，以及古希腊罗马文学，被认为揭示了“构成所有可知事物基础的一致性”，所以人文学科被认为应该占据大学最高地位。如果大学培养所谓自由而无用的灵魂，也就是无视职业训练，那么它的目的其实就是培养绅士，更进一步说，它就是培养贵族。大学在过去就是毫无掩饰地充当通过文化再生产以达到社会再生产的工具，这一点布迪厄早就指出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卡斯蒂利奥内在《朝臣论》中指出了有教养的人必须在精神、身体和思想能力上面都受到系统的锻炼，没有艺术才能和广博的知识，是无法进入上层社会的。而18世纪的牛津与剑桥这两所大学课程设置极为狭窄：只要求学生熟悉古典文学及有限的神学读物。直到十九世纪末，哈佛等大学的教育仍然以拉丁文为主。年轻人到大学学习，并不是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而是获得口舌便给、举止优雅这一类社交技能，建立人脉资源，为成为未来的国家精英做好准备。当然，就具体的教育内容而言，它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明显脱节。甚至有学者撰有《英国文化与工业精神的衰落，1850—1980年》一书，认为英国工业精神的衰落，应该部分归因于英国教育、英国文化界对工业精神的敌意。

与牛津和剑桥不同，伦敦大学学院一类的办学模式渗透了功利主义理念，它兼有自然科学、应用技术和人文学科、社会科学，更能适应现代性的工业化社会期待，这后来也变成了被普遍接受的西方现代大学的教育理念。而在此过程中，此消彼长，人文学科的黄金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西方人文学者们哀鸣人文学科的颓败，强烈的怨怼不满部分来源于对其前辈无比荣耀与辉煌的怀旧情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似

乎没有这样阔气的前辈，人文学科其实一直卑弱。1950年，苏联专家阿尔辛杰夫认为，社会主义大学应该培养的是工程师、农艺师以及医师这样有真才实学的技术专家，而不该是空口说白话的文科生。院系调整之后，文科、财经和政法这三类学科加起来的学生占比由1949年的33.1%，减少到了1957年的8%。“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句俗语，流行时间很长，说明了文科的边缘地位。但是，与过去相比，今天人文学科的地位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就这个方面来说，也很难说得上存在着危机。

第三，大学越来越具有商业化特征，威胁着人文学科的生存。今天的大学校长扮演的主要角色类似于董事长，主要考虑的事情是争取各种资源。办大学相当于办企业，其终端产品是学生。现在不再是首先考虑如何将他们培养成符合人性理想的人，而是考虑如何将他们打造成能适应后工业经济时代不断变化的职业需求的劳动力。就业导向使得大学的标准更侧重于直接的功利价值，因而与社会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人文学科，就被理解成了屠龙之技，不再受到瞩目。以前，文学作为民族文化的精华，作为想象共同体的有形存在被放置到最为凸显的位置，而今跨国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高于一切。大学里面奉行的企业化管理模式，其实是与人文学科倡导的学术自主性原则格格不入的。人文学科如果不能回应社会提出的挑战，如果不能理解数字化或人工智能的技术革命所引发的社会症候，不能回答生命医学的新成就所提出的新的伦理问题，那就不能为其合法性存在提供理由。人文学科为了证明自己的效用，部分放弃了自己的无



用之用，放弃了为认识而认识的合法化自我论证，转而走向文化政治。也就是说，通过强调自己的政治干预性来说明自己的意义与价值。在具体的策略上，西方的人文学科尤其是精英大学的文学研究领域开始了文化研究转向。但这种文化研究，目的是指向实践活动的，其最后的作用不是体现在自身，而是体现在一些社会运动或民主活动的成效上。就其内容而言，“文化”虽然给自己贴上了“跨学科”的名称，但是它没有自己特定的理论方法，也没有自己的专属研究领域，“文化”意味着任何对象。因此，它没有边界，任何确定的具体所指。因此，文化研究虽然是批判意识形态或资本主义体制的，吊诡的是，它的践行恰恰跟它宣称要反对的消费逻辑同一鼻孔出气：文化研究热衷的领域，如同性恋、后殖民、种族、激进政治乃至吊带衫、酒吧和吸血鬼之类，其实变成了文化时尚，而“文化”的概念就与货币一样，是无所指的能指，是一种交换价值。

如果说，全球的大学都越来越效法美国这样的办学模式，中国的大学似乎很难避免此种主流大势并置身局外。目前，中国的大学已经取消了985、211的称谓，踏上了建设一流大学的新征程。但是，根据20世纪一位加拿大学者雷丁斯的看法，所谓“一流大学”跟前面提到的“文化”概念一样，也是一个贫乏苍白的、没有内在品质的空洞目标，最适合技术官僚根据数目字方式来加以管理。衡量一个学者是否优秀的标准，不再是某种学术的内在的标准，而是比如引用率或者获奖项、在名刊发表论文数之类外在的量化标准。今天中国大学的填表之多，已经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

桌了。各种课题申请、职称申请、评奖申请、人才计划申请，各种学科或教学评估，各种排名或绩效考核，已经让人文学者们疲于奔命，穷于应付，而发现的快乐，求知的热情，自由的心态与高尚的情怀已经日益稀缺，而这一状态才是人文学者安身立命的基本条件。就此而言，中西方大学面临的人文学科的危机都是类似的。

第四，人文学科的危机是否可以理解为一种知识体系的内部崩解？实际上在很多年之前，我们就听说了各种“终结”的理论，比如维特根斯坦认为他研究的目的是为了“给捕蝇瓶里的苍蝇指出一条出路”。如果我们忠实于真理，我们应该做的是让哲学安息。海德格尔则认为，哲学的终结证实了科学技术控制和安排世界的胜利。此外，我们还听到了教育的终结、文学的终结、艺术的终结，甚至后结构主义也宣告了人的终结。但实际上，各种终结，并不是某种类型的精神活动寿终正寝了，只不过它到了转型的时刻。黑格尔宣判艺术的终结，其实不过就是说古典艺术的终结，而北美英文系不再流行文本精读和新批评，并不是说文学研究已经终结，而只是改变了它的研究方式，比如它在对于后现代理论的渴望或者文化研究的激情中找到了新的学术生产方式。

那么，从知识学的角度来说，中国的人文学科是否存在危机呢？在我看来，这也许才是最严峻的问题。问题的关键实际上是中国的人文学科就从未得到充分发展过。今天，我们接受的知识体系基本上来自西方，在这里，容易速成的是理工科，而最不容易掌握的是文科知识，尤其是人文学科，因为它一方面可能与自然科学或应用科学共享某些根本的方法、论证线路或者观物方式，它们都共同指向真理；但是另一方面，人文学科始终与传统、经验、语言、记忆、理解、生活习俗尤其是价值观紧密相连，它无法做到符号化、形式化。今天，中国有不少科技领域已经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但是人文学科与西方相比，整体水平还存在着巨大落差。在我看来，当我们认识不到这一点的时候，这对我们来说，也许才意味着人文学科最大的危机。



## 学术的悬浮化及其克服

成伯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教授

当前学界，至少是我较为熟悉的社会学界，存在着一种值得关注的发展态势，也就是学术的悬浮化倾向。周飞舟曾将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影响概括为悬浮型政权，也就是“使整个国家政权‘悬浮’于乡村社会之上”。如今，学术也大有悬浮于整个社会之上的态势。<sup>①</sup>学术不能扎根于具体的社会脉络，缺乏现实感，不能直指世道人心，几成通病。换言之，学术探索似乎跟真实的社会生活无关，沦为同行之间的一种符号游戏。

这种态势当然是学术场域的逻辑所致。而要理解学术场域运作的逻辑，我们首先需要定位学术场域与社会中的元场域之间的关系。<sup>②</sup>所谓元场域也就是权力场域，是社会秩序和日常运作的主导者。中国的学术场域极度依赖权力场域，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当然，学术场域内部也有分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各有差异，它们的自主性大致跟专业化程度成正比。且不说权力场域对学术场域的直接管理，以及政治逻辑经常在学界权威分层、资源和头衔分配、重大议题设置等方面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单说权力场域本身，就是一个高度科层化和自我闭锁的系统，其所覆盖之处，一定意义上可谓是将学界探究的触角系统地屏蔽在外。现代经验性社会科学必须立足于确切的事实，若无真情实况的掌握，何来真知灼见？我们不难觉察，目前已有的极少数较为翔实的经验研究，基本上都是针对边缘性现象和人群展开的。这固然反映了学者关怀弱势群体的倾向，更为现实的原因，恐怕是那些人群所在之处，是研究者容易接近和能够进入的田野。事实上操控此类人群之结构性机会的力量，却在研究者通常够不着的地方。在“国之利器不可示人”的设定下，学界想要准确、及时地掌握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真实状况已是颇为困难了，遑论探究其中的奥秘及根本机制了。

当然，这并不是说学术场域跟权力场域没有互动。恰恰相反，除了上述直接管理之外，其间的互动日渐

频繁。一则，权力行使，特别是公共决策的正当化，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在当今社会显得愈益迫切，而专家学者的在场，可为决策科学化提供佐证——至少目前来看，科学化是正当化的最佳辩护甚或是最佳替代。当然，不难预期，



① 周飞舟：《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3期。

② Bourdieu, Pierre: *Homo Academicus*, translated by Peter Colli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专家学者参与其中的机会，取决于专家学者配合机会提供者的程度。凡所言不符决策者期待的人，很快就会知道自己不适合参与这种“游戏”，且也不大可能再有机会参与。二则，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的复杂化，权力场域确实需要专家学者提供专门的智力支持。但这种论证性支持必须在既定的框架内展开，而且应聚焦具体问题解决的话语对策，不可在深层根源和顶层设计上自作主张。如此一来，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能够直面现实根本问题的学术思考，都很难传递到权力场域。经常是在最需要直面现实的场合，专家学者竞相表演着貌似无懈可击，其实无关痛痒的高谈阔论——但这仅是学术话语的空转，缺乏对现实的深层指涉和具体关联。

### 学术场域的运作逻辑

学术的内卷化如今已然非常明显。所谓学术内卷化，就是固着在一定的水平





① 成伯清：《走出现代性——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新定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②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平不断自我重复，既无突破式发展，也无渐进性增长。我们知道，当代中国社会科学是舶来品，从最初的缺乏规范，到如今的有模有样，从形式上看确实是有所进步。但如果要问，这种探索，或者从国家层面来看，巨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到底产生了哪些关于中国社会的洞见和洞察？若说是乏善可陈，大概也没有多少人反对。何以如此？显然跟学界自身的生态有关。越来越指标化的管理方式，并不鼓励“板凳要坐十年冷”或“十年磨一剑”式的潜心向学，而是鼓励高显示度的作品，结果更容易见效的短平快做派就轻松胜出。即便是各种所谓的重大课题，也是依照工程的模式进行快捷组装，而少有真正的鸿篇巨制。这种研究进路，必多是浮泛之作。

虽然学界之外的指挥棒还在起着主导作用，但毕竟专业性在不断增强。于是，移植来的行话术语，越来越让一般公众不知所云。而一旦学术的阅评人和评议人局限于同行之中，甚至是一小群同一研究领域的同行，那么可以想见，炫技式研究取向就会超过对现实问题的关怀。研究领域的不断分化，确实有利于学者之间的错位竞争，也可满足占山为王式的“利基”（niche）冲动，但我们都知，社会现象都是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绝不可能切割出一小块来彻底探究一番，然后声称问题全部得到澄清，因为这一小块儿是更大系统建构的产物，而且在边界上也肯定切割不清。尤其是中国这种依然带有总体性支配特色的社会，即便是特定领域的看似明确的项目制治理，也不可能围绕特定的项目即可澄清问题的关键所在，因为项目本身只是更大更高部分的一种治理策略而已。但学术研究的碎片化，几乎是无法遏止

的趋向，因为现有的研究范式和手段，现有的学科训练，以及现有的期刊审稿制度，都要求界定明确的可以操作的经验性研究。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这种经验或实证（empirical）研究，随着对数据分析技术的日益强调，涵义已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经验不再是我们直接体验和感受到的现象，而成为通过测量工具所获得的数据或资料<sup>①</sup>。不少研究者可能擅长数据处理和模型建构，但对数据所反映的现象，可能根本就没有现场的切身感受。这种缺乏现实感的研究者，怎么可能言之有物？更别谈能有惊人的经验事实的发现了。

导致学术悬浮化的另外一个深层原因，源于我们用以理解现实的概念工具跟我们的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社会及社会成员的自我理解，不仅是指导日常实践的理念，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现实的构成要素。离开了这种自我理解，试图以超然的概念去把握社会的实质，往往难以奏效。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社会学家作为研究领域的现象，已是有意地构成了的现象。‘进入’这种领域的条件，就是要了解行动者在‘进行’社会生活中的日常活动时已经知晓了什么和必须知晓什么。就预先假定了行动者也具有一定的概念能力来把握指涉他们行为的概念而言，社会学观察者所发明的概念是‘二级’概念。但就社会科学的本性而言，这些概念能够通过为社会生活本身所采用而成为‘一级’概念”<sup>②</sup>。在理想状态下，学术概念和现实生活应该能够存在双向的诠释关系。显然，当今中国社会科学所用的概念大都是舶来之物，虽然随着社会生活的现代化，有些概念成为日常生活用语，但毕竟主要的概念不是源自生活。在以舶来的概念总结和解说现实社会生活时，经常出现挠不着痒处或戳不到痛点的情况。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未能真正勾连和扎根于日常生活和传统文化，自然也就悬浮化了。

事实上，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界普遍存在着文化上无根的现象。我们在追溯一个学术概念的来龙去脉和文化意蕴时，更有可能参考威廉斯的《关键词》，而不太可能去查阅《康熙字典》。因为我们所用的虽然还是汉字，但其含义已经跟原初大不相同了。在当代语境中经历了多重转换之后，汉字越来越抽象化，变为纯粹的符号，很难再谈得上深厚的底蕴了，绝大多

数社会科学术语显然不能到中国传统文化里去追根溯源。这种变化,固然可以使汉语更为适应现代思维和表达,有进步的成分,但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斩断了我们跟过往历史的联系。由此,我们当能体会严复当年在翻译西学的时候,何以要“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了!再三斟酌的用意,无非是想将西学接续上中国的智识传统。确实,拿来的东西如果不经创造性的转化,终究是不能融会贯通,更别说使用起来得心应手。

除了制度性隔离、专业内卷化和碎片化以及文化上的无根之外,如今的学术悬浮化,可能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学者的世代继替。我们知道,不同时代的学者的社会轨迹不同,卷入和介入真实生活的程度也不同。如果将目前中国社会学者大致分为三代,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的差别。20世纪40、50年代出生的学者,在多次运动中大都曾被强行摁到过社会基层,在风云变幻的复杂斗争中摸爬滚打,了解社会真相,且有一般的知识分子情怀,尽管在专业视角上可能不够深入。20世纪60、70年代出生的学者,亲身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变,但他们已开始知识分子与学者角色之间游移,不过,他们对现实问题还具备一定的整体感受。而20世纪80、90年代出生的学者,生活轨迹基本上在各类学校里面转圈,他们受过良好的专业训练,专业认同明确,但也容易失落于学术“利基”之中,难以形成总体性视角,也无丰富的生活底蕴支撑自己的学术感受力和洞察力。

### 走出学术悬浮的路径

制度性隔离、专业内卷化和碎片化以及文化上的无根,大概是如今学术悬浮化的主要原因了。那么,如何走出这种状态呢?

首先,让支撑和维持社会架构的基础性制度及其运作过程变得开放和透明。事实上,适应现代复杂社会要求的治理结构,必须具有自我矫正的机制,而学术探究正是这种制度性反思和矫正机制之一。如果不能将学术作为现代社会运行过程中一种重要的反思和矫正力量善加使用,势必难以摆脱运行成本高昂且前途未卜的境况。吉登斯曾言,“面对不断加速的社会

变迁,唯有反思性地改革自身制度的社会,方能充满信心地直面未来。一个社会促进活跃而富有想象力的社会学文化的程度,是衡量这个社会灵活性和开放性的一个尺度”<sup>①</sup>。

其次,就学术的内卷化和碎片化而言,只有充分发扬学术反思精神和自我批判意识,特别是强化学术共同体的自觉。一方面克服狭隘的专业藩篱和世代隔阂,增加相互对话;另一方面走出自我指涉的闭环,直面现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需要系统反思现代学术与学科体系的潜在前提和历史局限。学术发展具有自身的路径依赖,也受制于置身其中的社会结构,但学术的反思性和反身性,正是学术超越自身的根源和保证。当然,学术更应深入现实,扎根现实,从现实中汲取力量。撞击现实越深,学术的反弹力量就越强。如果悬浮于现实之上,学术也必将软弱无力。

最后,克服文化上的无根状态。诚然,如今中国的社会科学,颇让人觉得是卡在不中不西、不古不今之间。对于这种尴尬处境,其实已有不少同仁在探索出路。近年来,社会学研究中出现的明显的历史转向就是一种尝试。这不仅是将历史维度带回到社会学之中,而且也是通过亲近自身的历史,重新找到学术的根基和生长的土壤。探究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涵泳于历史的过程,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适应时代的文化品位和精神家园。所以,如今社会科学研究之历史转向,绝非复古,而是一种文化自觉,一种以当代意识重新激活历史的努力。而且,只有明晓历史,才能更为切实准确地理解当今之世,从历史转折中看到社会和文化深层结构的变与不变。

① Anthony Giddens: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除了资源以及必要的规范之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学科归属之间是要适当区分的。置身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中的学人，不免会钟情于马克思、韦伯以及涂尔干等古典社会理论家。他们卓越的研究并没有



受到所处时代学科建制不够发达的限制，却开创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马克思从法学转到哲学，随后转向经济学，又精于或涉足史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数学、化学、农学等诸多学科，但其研究却不是学科性的，而是依问题及其理论引领而展开，且实际上贯穿了自觉的学科批判意识。韦伯虽然意识到与物化时代相伴随的理性化与科层化现象，却没有在意其对学科体系的影响，韦伯关注的还是基于严谨的学科规范及其学术研究应有的中立性。涂尔干具有明确的学科意识，但其创立的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本身又要求超越学科，直指国家与社会责任。当然，也正是从韦伯和涂尔干开始，随着现代大学及其现代社会分工体系一道发展起来的现代社会科学，毕竟已形成并置身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科规范与学术研究之间总体上说来是平衡有序的，其贡献也是有目共睹。

本文所分析的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

## 人文社科体系的琐细庞杂倾向 及其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邹诗鹏，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学学科体系的琐细庞杂现象，主要还是“国产”的结果，但对问题本身还得进行辩证分析。

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学扩招以来，中国大学专业院系快速发展，是理工科先行，随后文科跟进。在短短三十多年里，我们建立起堪称世界第一的学科体系，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无疑，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学科建设，包括必要的学科规模及其细化方面的建设，对于包括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内的整个科学研究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形成了有目共睹的研究成果、积累及传统。就此而言，应对体制内通过学科建设所获得的成就有基本的评估，这是我们查找问题并进行检讨的前提。

在高速的学科建设过程中，的确产生了本文所说的学科琐细庞杂现象。20世纪80、90年代，大学的中层主要还是以系为主，如今中国大学中层结构几乎没有系而只有院（有的大学在学院上还有“部”），“系”几乎都成为“院”。随着学科分化，原有的一个学院分成若干个学院，教研室也没有自动消亡，其不仅保留并随着学科增加而增加，还纷纷拓展为研究院、所或中心——当然还有各种看上去不属于或凌驾于学院之上并直属校方的各种研究院、所及中心。这些研究机构，连同专业、硕士点、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等，形成了一个琐细庞杂的大学及科研单位的学科体系。各大学基本上已习惯于在这些数字上竞争和攀比，种种绩效、评估、排名也助长了这样一种学科发展模式。因此，学科建设陷入了某种简单拼数字的竞争及发展格局。政策层面实际上也不得不顺应这样的发展要求，特别表现为定期进行的学科目录修订与学科点的增设。学科目录的修订虽然会进行一定的调整、合并或者删减，但主要还是做增量，有时还是带一些“大跃进”式的增量。一级学科提格为门类，二级提格为一级，三级提格为二级。三级学科做得更细，甚至于





连课题也可能直接升级为三级学科。老的一级学科做这种细分还勉强,一些新的且本来学科面就小的一级学科,也这样细分,就显得稀奇古怪了。事实上,学科的规划与评价似乎将学科形式的扩张与细分看成是必然的逻辑。一方面是学科数量激增,名目繁多,蔚为壮观;另一方面,学科微观化,螺蛳壳里做道场。往往是旧的僵化的系统尚未过去,新的更为庞杂的学科系统已开始实施,繁复冗赘,叠床架屋。人们发现,在过度细化的学科体系中,很多分布于不同学科的所谓二级、三级学科,从资源、基础、传统乃至论域都是相通甚至一致的,只是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见怪而不惊,或因习惯,或因其他一些因素(如利益因素)。至于隔几年一次的研究生学位点尤其是博士学位点的增设,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更是成为各大学及相关机构工作的重点。

学科设置及学科建设,本是手段,好比建筑工程的搭脚手架工作一样,其功能及目的是促进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但是,从上述现象上看,在正常的规模及其学科细分的基础上,的确存在着学科膨胀发展及单纯的量化竞争情形,学科体系五花八门、名目繁多,既琐细无序,又缺乏整体感与有机性。学科的琐细庞杂及其管理要求,也必然伴随着科层化乃至官僚化,常使学科建设的效率大打折扣。琐细庞杂的学科体系,已经直接影响到其功能及目的,甚至出现了功能与目的反过来从属于学科的科层化要求的异化情形。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表现为如下主要症候。

**一是碎片化。**有时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是如此,为了使研究对象更为清楚,需要将对象分解为不同的层面,便于再次聚合,并使研究者形成整体认知。这属于合理的分化与细化,但这里所讲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碎片化,则是学科过度细化的产物。导致人文科学研究碎片化的原因不止一个,但学科的琐细庞杂是其中一大原因。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课题,大都存在着自身的现实性、整体性及复杂性等问题,且都不是依学科的规律或规范“长”出来的,但人们将问题转变成学科研究对象时,因为学科体系本身的琐细庞杂,会出现碎片化。比如,时下诸多学科都会研究分工,分工问

题也值得从多个学科展开研究(政治学、公共管理、社会保障、经济学、企业管理、哲学、史学、传播学、心理学、统计学等),但如果仅依学科规范(而且多是下面的二级学科或三级学科规范)展开,恐怕就会使分工本身碎片化,进而不可能形成关于分工的整体的把握与判断。尽管如此,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很容易想当然地认定自己得出的研究结论就是对分工的整体把握与判断,但实际上这无异于盲人摸象。可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保持一种整体感至关重要,时下学科过度细化倾向总是意味着对整体性的消解以及对宏观研究的拒斥,并且这种碎片化倾向实际上还在不断加剧。

**二是虚假化。**如果出现学科细化与社会事实相疏离的情形,那么,越是服从于学科的需要,就越有可能脱离社会事实,越容易导致研究变形走样,导致研究的虚假化。近年来坊间流行这样一种观点:学科越是细分,规范性就越强,便会确保研究成果的学术水准及其真实性。这种想法之所以有较大的市场,因为它针对的正是之前存在的某种宏大叙事必建构于宏大学科的惯常作法。不过,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基于过于细分的学科所建立起来的微观研究及其实证化路数,有可能更加远离真实的研究对象。因为学科大小与研究成果并不具有必然联系。学科大并不意味着研究成果不真,学科小也并不意味着研究成果一定会真。大体说来,对有些问题而言,学科细化或有益于使问题细化,也会有益于研究,但对大多数问题而言,学科细化未必意味着使问题细化,循着细化的学科研究反倒使问题本身失真,并不值得倡导。研究的真实性并不必然取决于细化程度,而是取决于研究的水准及



其直言程度。当然,学科细化还容易加剧学术研究的形式化,形式化的东西多起来,成果的真实性就显得可疑。

**三是内卷化。**学科的过度细化及其庞杂,使得人们逐渐回归到自己的学科领域,远离社会实践,且不断巩固学科壁垒使学科固化。学院化也可以看成内卷化的表现,因为学院化本身正是自觉远离生活现实,并据守及收缩学科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所强调的职业意识,也可能遮盖实质上的内卷化倾向。因为种种原因,学者们已经习惯于并乐于待在自己的小学科中,放任学科壁垒扩大,而无意于突破学科藩篱。长期以来,人文社会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养成了一种学科惰性,除非必须做出应急式或主动的突破,一般情况下人文学科更愿意并习惯于待在某一固定的学科范式中。事实上,内卷化还指因习惯于学科而无视外部世界的变化,从而产生的惰性,表现为对外部世界漠然处之,甚至于抵制外部世界的干预。从很大程度上说,人文学者承认内卷化是需要勇气的。最近这些年来,因时代及代际境遇等方面的原因,内卷化倾向在一些年轻的人文社科工作者那里总体上呈加剧之势,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上的宅化倾向,很容易导致一些年轻同行疏离社会现实。而画地为牢、自得其乐的小学科经营模式,实际上又会巩固这种内卷化倾向。

如何改变这样一种人文社会学科的琐细庞杂且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局面?目前有关方面已经开始注意与重视这一问题,并正在采取一些举措,如强调学科以及学位点创立或增设的规范与科学,尊重学科发展的市场规律并发挥市场调节功能;重视基础学

科及成熟学科的支撑效应;注重新兴学科设计的学科关联性,避免学科建设的“摊大饼”或“土围子化”;将科学学科的研究生培养同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区分开来;拓展科学学位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科学学位研究生的知识视野及实践能力的培养;做实通识教育,避免年轻研究者在专业上过早狭窄化,鼓励人文社会科学开展跨学科及交叉学科研究,消除不应有的学科樊篱与壁垒;等等。以上这些都是具有肯定意义并可以期待产生良好效应的举措。

我们提出问题也希望人们关注问题的严峻性。但认识到问题的严峻性并不意味着必然要采取一种激进的改革措施。学科的过度细分及学科体系的庞杂倾向,既涉及科层化及合理化(在这一方面,回到古典时代已经成为幻想),也涉及经年形成的惯性及不断增加的利益因素,恰恰不宜施行激进式的改革。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在不改变人们价值观的前提下,在制度安排及组织措施上做文章,引导总是比教导容易。比如,时下从科研规划、人才项目、刊物栏目设计及相关资源安排上进行改革,就有利于从资源安排上破除学科壁垒,克服学科过度细化带来的弊端,也有益于积极引导形成高质量学术研究的风尚。

一方面是学科的规范性建设,另一方面则是对学科的应有超越,如何做到不顾此失彼,的确是一项难题。本文的分析绝不是要否定学科建设的意义。显然,人文社会科学还是要强调学科性的,对于很多研究而言,学科的规模以及细化都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没有学科的规范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就容易走入歧途,出现种种“野狐禅”。极端些说,即使“土围子”化的学科产品也比空疏无当的所谓成果要好,前者毕竟是规范的产物。消除学科樊篱,显然不是不要学科。因而,在强调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时,也应防止出现以跨学科或交叉学科否定学科的倾向。几十年下来,我们的学科积累谈不上厚实,更不能做太多折腾。无论如何,我们从学术研究的消极影响方面关注当下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过度细化及体系庞杂倾向,也是意在进一步推进学科的良好建设与发展。



## 学科评估指标误置下的艺术学科发展难题

杨扬, 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教授

学科评估是有关部门对大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状况的一项检查, 评估的结果对今天的“双一流”大学建设有着实际影响。所以, 各大学都对评估予以高度重视。但评估活动也带来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比较突出的, 就是怎么防止一刀切产生的副作用。

### 评估指标体系下的人文学科建设

在一个评估指标体系的引导下, 一些具有自身办学传统和办学特色的院校, 会不会为了追求评估指标数据, 而削弱乃至放弃了自己的特色? 我们看到一些理工科院校和综合学科院校, 在评估过程中, 相对而言, 对接指标比较顺当, 排名情况也接近行业内专业人士心目中的序列。但对于一些人文学科色彩比较浓烈的院校, 尤其是艺术院校, 对于学科评估的指标体系和排名情况, 就不太愿意接受。对于一些刚性的指标体系, 譬如论文和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因子, 以及诸如各种人才的头衔和获奖情况等, 人文学科学者可能在认同上差异比较大。在现当代历史上曾经有过一些学者, 什么头衔也没有, 甚至论文等学术成果遭遇冷落, 但若干年后, 学术界最终接受并予以高度评价。而一些当时轰轰烈烈的人文学术成果, 放上一段时间来观察, 未必真有那么强大的影响和价值。这些都是真真切切发生在中国当代人文学术领域的事情, 其教训值得总结。所以, 相对于理工科的评估指标体系而言, 人文学术的评价要复杂一些, 不是那么立竿见影, 不是那么实用有效。哲学上常常讲“无用之用”, 美学理论中有“非功利”说, 体现的都是一种柔性的、非指标体系所能够显示的内在价值追求。这些价值指标和学术追求如何在学科评估中得到尊重, 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今天在很多考核场合都会见到一些被考核的

人文学者, 勉为其难地列数自己的诸多成就和社会影响。这些做法很难说是学者自己愿意来炫耀的, 但考核评估中似乎非如此张扬自己不可, 要不就不够格, 就不可能引起考核专家的高度重视。所以, 对于一些人文学术



项目的评估, 从专家的角度会比较关注其新意所在, 包括材料、方法的运用, 以及在专业领域的评价等。但现在的一些考核指标中, 常常会有领导批示等评价指标。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学科评估指标, 的确在一定的社会氛围中, 有其显示度和实际的功效性, 但不能因此就认定这一套完全有效, 没有瑕疵, 不需修正, 不思改进。

有时我们需要检讨在评估中衰落下去的那些名校的强势学科, 也要反省那些学科评估中高居榜首的、所谓一流学校一流学科。我们在政治生态、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上, 这些年逐渐淡化急功近利的考核标准, 而注重和强化和谐共生的建设理念。那么, 在人文学术领域, 是不是也有必要强调这种和谐共生的学科建设理念呢? 学科建设在当前条件下, 大都还是在国家行政框架的规划之下进行资源配置。经过数十年的建设, 今天中国高校有非常抢眼的扩容和强体, 但这种进展, 在一些学科建设领域,





是国家的强制行为,很多学科间的竞争,投入是不平等的。当然,国家扶持的一些学科建设,未必是给了钱就解决了问题,在这一意义上,增加评估加竞争机制是必要的,但具体要看最后评估出来的情况。

### 艺术学科中的评估指标问题

目前这些评估中,艺术院校的问题比较大。艺术院校的学科建设,情况可能比综合类院校更加复杂。从目前学科评估的艺术院校的排名情况来看,艺术学科排名占据前2%的一些院校,尽管排名前列,但从根本上讲,很少甚至从来就没有在行业中培养过各种优秀的艺术人才。其之所以能跻身前列,可能就是依靠综合大学的优势以及巨大的学校体量,大量发表学术论文。在学科评估中,论文发表作为艺术院校的重要评价指标,目前已普遍受到重视,类似于表演、音乐演奏和传统戏剧等专业学科,改变了原来单一注重技能训练的培养模式,要求教师在写论文和发表论文上下功夫,增加国家课题的申请等。但这种纠偏应该有一个度的限制,否则,也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导致艺术院校办学特色的减弱。以表演艺术为例,像京昆艺术、舞蹈艺术等,都是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在技能训练上。而且,表演艺术中的很多门类,教师和学生的成果展示是在舞台表演中。你不可能强制要求一个芭蕾舞演员或京昆演员,每年交出几篇C刊论文,也不可能要求这些演员在学位程度上,都达到博士研究生的程度。对于一些综合性院校的艺术学科教师而言,发表论文、申请课题和获得博士学位,基本上是门槛线,与文史哲等人文学科教师的要求,

没什么两样,但对于一些专业性的艺术院校而言,真正要实现这些所谓的门槛线,却存在相当大的困难。其原因就在于艺术表演的训练和培养,有自己的时间周期和规律。一个芭蕾舞演员,最好的年龄时段,可能在30岁前后,如果按照目前的研究生培养模式,等这些青年教师拿到博士学位时,基本上跳不动了。同样的情况,在京昆艺术专业领域也存在。一些京昆青年教师在学历一栏中,博士学位基本上是空缺,很少有一线的青年教师既是艺术学博士,又是当红的表演艺术家。所以,在艺术院校表演专业一线的青年教師中,专业做得好的,不乏其人,但在学科评估中,他们的显示度可能远远不及一个一般院校普通教师的显示度。因为艺术院校的这些青年教师,大量时间是在技能训练和演出呈现上,至于长江学者、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头衔,跟他们基本上是风马牛不相及。

或许对于艺术院校那些青年教师和艺术家个体而言,不会太在意学科评估价值指标,但对于艺术院校学科建设的整体而言,目前多项考核指标的严重不切实际,不仅体现出评估体系的刚性缺陷,也影响到国家对艺术院校的投入和扶持。像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等中国顶级的表演类艺术院校,在学科建设上似乎都遭遇到某种共同的瓶颈,在一个与综合性大学和理工科院校共享用的评估系统平台上,艺术院校不仅没有光彩照人,获得高度重视,相反,它们普遍陷于一种尴尬的境地。明确地说,这些艺术院校在自己最强势的戏剧影视学学科评估上,没有哪一家进入一流行列。这样的评估结果,似乎与中国艺术院校的现状之间,有某种程度的错位。如果国家的相关职能部门照此来规划中国艺术院校的学科布局和经费投入,一定会影响到中国艺术院校向世界一流艺术院校水准迈进的步伐和节奏。因为这些院校的最强学科专业都没有进入中国最好的艺术院校的学科行列,那么,国家是不是要重新考虑规划艺术院校的相关学科和经费投入?真实的情况是,中央戏剧学院、上海戏剧学院和北京电影学院,迄今为止依然是戏剧影视领域中国最顶尖的高等院校,在世界上都享有崇高的声誉。所以,某种评价指标的误置会导致国家教育决策的误判,进而影响中国高等教育的建设进程。



## 仰望星空的价值理想追求

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之后,新的形势研判和教育目标的实施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国家有关部门对中国高校的学科建设有了不同以往的强烈期待和迫切要求。如何将时代精神和价值目标在新一轮学科建设上体现出来,这是目前各高校都在探索之中的工作。学科建设不仅仅是国家政策、法规的调整问题,还有教育自身的规律和适应性要求。如何兼顾国家政策调整和教育事业的内在需求,从中寻求到某种真正有效的平衡点,这是各级教委和高等院校都在努力探讨的新问题。例如,目前各教委和院校都在推行的“思政学科”和“学科思政”工作。一般而言,“思政学科”讲得比较多,落实指标也比较明确,要求成立马克思主义学院,配备专职教师,开设课程名称和课时要求。但“学科思政”因为是所有学科全覆盖,理解上和执行上就有所不同。大多数的院校都是从全国教育大会提到的教育首要任务和根本任务出发,将自觉培养什么人的问题,作为“学科思政”工作的指导思想和考核标准。首先就是对教师队伍提出要求,第一是学校的规章制度中有没有将师德师风问题写入,如果没有,在考核中就会体现出来。其次,对教师的考核指标中,原来比较多地注重项目和论文发表,而当下增加了青年教师的政治学习培训,接受师德师风教育培训等环节。有的学校是将此作为教师上岗培训的必修课,没有这方面的记录,就不能上岗上课。可以说,这些新措施已经在全国高校中铺开,而这些考评指标和建设内容,在前些年的学科评估指标中,是没有的。2018年年底,上海市教委对所属各大学进行分类考核的反馈意见中,列出了党的全面领导、师德师风建设、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等相关考核指标,凸显了与全国教育大会相关内容的对接。只是目前的考核指标还是比较侧重制度建设和管理办法的新规范,具体地说,就是考核各院校有没有制定师德师风建设的中长期规划,有没有管理细则,有没有设立马克思主义学院,有没有配备专职人员,课程开设和课时安排有没有落实等。与以往学科评估侧重学术论文发表、课题项目申报和各种学术称号人员的占比相比较,目前各地教委出台的考核指标中,并没

有放松原有的类似论文、课题、学者头衔等因素的所占比,与此同时,增加了师德师风等新指标内容。当前条件下,管理的权威性基本上在各高校是竖立起来了,学科管理越来越严,但促进学科发展的有效性,发挥第一线教师和研究人员的积极性和开创性问题,似乎慢慢凸显出来。把教师管理得规规矩矩,把学科人员编制和经费管得很死,那么创造性的工作如何获取支持,这是一个新的突出的问题,而且是中国式的高等教育问题。对于人文学术研究者,包括艺术院校的研究者在人才培养上遇到的挑战,不能不让我们想起人文教育所强调的仰望星空的价值理想追求。这种价值理想追求的培养是人文学科和艺术教育的目标之一,看起来很虚很缥缈,但的确是人文教育和艺术教育不可或缺的精神气质和理想追求。目前,学科建设强调严格管理,强调规章制度的执行,还是容易做到,在历史上也曾经有可以比照的经验,但开拓性的、创造性的,具有前瞻性的教育目标的设置和学科培育的成功经验,不是太多,而是太少。看学科建设的成效,不能仅仅瞄准那些容易在数据表格上统计出来的东西,还应该深入体会那些无法用数字统计,而只有靠心灵体会和情感体验才能够获得的深度内容。当今中国高校建设中,理工科院校和综合性院校的建设速度和办学能力的提升,是非常快的,但在人文学术院校,尤其是艺术院校的扩容和办学的提升上,还没有像前者那样获得重视。像北京、上海两地的艺术院校,与欧美的特大城市的艺术院校的分布和数量相比,中国的艺术教育还是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如此看来,所谓学科建设还是有很多事要做,也值得大家去努力。



在现代大学体制内，所有学科的发展，都有一个内在的历程。从亚里士多德时期到近代学科体系的确立，各个学科的发展都具有自身的逻辑，有自己的来龙去脉，这背后是一套理念。就社会科学来看，从政治学、



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到人类学等，每一个学科自身的成长都有其内在的要求与节奏，有历史发展的背景，有社会分化的基础，有人类认识的深入，甚至有政治模式的影响。现代学科呈现出的现有形态是历史的产物，形成现代的学科体系有其理由。在现代学科体制内，现代学术已经不太可能是百科全书式的工作，术业有专攻是现代学术的基本要求，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研究方向，都是从某一个角度来进行研究，这是推进学术研究的重要基础。现在都讲跨学科研究，其实跨学科的前提首先是各个学科自身的成熟，包括方法论的成熟。只有在学科成熟的条件下，才能提供给其他学科成熟的视野和成熟的方法，这样才能做到真正的跨学科研究。现如今，要构建中国的话语体系和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也要有自身的逻辑。你有什么样的理念？你有什么样的逻辑？你能提供什么样的方法？你的学科成熟的标志是什么？你与现代学科体系的关系是什

## 破除学科壁垒与人文学科生态重构

孙向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院长、教授

么？等等，在这些方面必须有清晰的自我认识，否则一哄而上搞学科建设就不可能有长久的生命力。

### 中国现有学科体系的复杂性

学科体系在中国大学中是一个复杂性的存在，对这个现实必须要有清楚的认识。1949年之后，哲学系都应该叫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经济学系应该是政治经济学系，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取消了；庞大的经济科系，则包括了工业经济、农业经济、国民经济等，这完全是另外一套框架下形成的学科体系，这样一个体系的背后有鲜明的理念。现在忽然变成了哲学学院，变成了经济学院，这背后也是有理念变化的。我们只看到学科建制上的变化，却没有看到任何关于理念变化的说明。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中国大学的学科体系是最为混杂的，背后有着不同的逻辑和理念。市场经济发展起来后，也有利益与权力的影响。就哲学而言，目前下设八个二级学科，哲学本来应该是最讲逻辑的，但现在八个二级学科下，基本看不出什么一致的逻辑，马哲、中哲、西哲，接下来是伦理、宗教、科学技术哲学、美学、逻辑学，跟哲学的内在逻辑不甚匹配。

从哲学自身的发展来看，实践智慧与理论智慧的划分是有一定道理的，再加上哲学史与逻辑学的训练，构成了哲学教育四个主要方向，背后有着较明确的逻辑，也有着复杂的历史。现在中国大学哲学学科的划分，有很大的偶然性，甚至和某些著名高校的教研室的成立有关。如此严肃的学科研究，尤其是现在牵涉着多方利益的学科建设，其实在中国的起源有着非常大的偶然性。所以，如果我们要严肃对待学科建设的话，就需要有一个严厉的、严肃的态度来反思今天的中国学科体系是怎么建构起来的。这里面可能有着全世界最复杂的历史背景，既有来自西方大学的影响，





也有来自计划经济的影响,更有来自某些权威大佬的意见。这个“复杂”的体系在现有的体制内有着一种膨胀的发展冲动,这其实是很危险,也是很浪费的。

我们讲学科体系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和必然性,在全世界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分化。在西方,很多学科是与殖民历史有关的,有些学科是与帝国体制有关的。有诞生、有消亡,起起伏伏似乎也很正常,在规范性之外也都有着某种混乱。因此,在世界范围,学科的建制似乎算不上大问题,在国外大学里,也很少讲要如何突破学科壁垒。在学科之外,通过建立很多跨学科的研究中心,来破除学科的固有边界,推进对于真实问题的真正研究。因此,面对真实的问题,学科算不上什么大的阻碍。那么在中国的大学里,为什么学科会成为一种阻碍呢?为什么会用“学科壁垒”“学科藩篱”来形容学科对于研究工作的阻碍呢?这中间最大的问题是,在现实中,学科因为现有体制的关系,有着强烈固化的倾向,教育部与各个省市,会根据现有的学科体系来进行各种资金和资源的投入。当下中国一边在讲要如何打破学科壁垒,实现各种合作和流动;另一边却是所有学科如果有博士点的话,它的博导就必须是固定的,很少存在跨学科或跨专业的研究者。比如,哲学下设了八个二级专业,博导便隶属各个专业,只能在某个方向成为博导,其他方向就不行。像黑格尔这样,既写逻辑学,又写自然哲学,还写法哲学,其在现有体系里应该算哪个方向的博导?还有各种学术期刊的栏目设立,也都是按照类似思路来处理的。于是会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一位学者发表一篇

文章,人家觉得这篇文章既不算中哲,也不算马哲,也不算西哲,不知道往哪个栏目放。我说这是不是哲学呢?如果是,为什么没地方放呢?肯定是这种设置本身出了问题。因为这样一种分类,只找得到各种分方向的哲学学科,哲学本身却找不到了。人们总是会问你,你到底是什么哲学专业的?因为你的文章又被外哲转,又被中哲转,又被伦理学科转。在我看来,这很简单,就是做哲学研究的。这就是目前学科的问题,在非反思前提下建立的各种学科,在现实中被各种体制固化,一方面丧失了自己;另一方也越来越难以面对真正的问题。

### “双一流”学科建设带来的新问题

“双一流”的建设给大学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也在学科发展上带来一些新问题。“双一流”建设与以往建设方案的最大差异就是它的建设方针除了强调一流大学的建设,更强调一流学科的建设。配合学科的排名,现在大学的建设似乎有了更强的针对性,不像211、985高校的建设,只是强调一流大学的建设,而没有深入学科的内部。“双一流”的建设让更多大学以其“一流的学科”跻身“双一流”大学的建设名单。这给学科带来发展动力的同时,也给学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问题。其一,现有的某些不合理的学科设置,在更多资源、更多投入的影响下,已经不单单是学科内在逻辑的固化,更因为利益分配的原因而变得僵化。学科壁垒的问题会变得更加严重。其二,学科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与节奏,有自身生长的原因。现有的体制下,常常不是根据学科群的发展生态来建设学科,而是根据排名,根据是





否纳入“双一流”建设名单而任意削减学科或者合并学科，导致学科发展自然生态的恶化，形成了更加不平衡的学科发展态势。其三，由于各大类学科内部学科划分的不平衡，很多重要学科内部的学科划分少而简单，而某些大类学科则琐细而繁复，于是导致很多大学贪图学科门类的齐全，盲目求全求大，以此确立自身的学科“优势”，这并不符合大学自身发展的逻辑。凡此种种，更多的外部因素给本已不甚合理的中国大学的学科体系带来了更多的负面影响。

### 真实的问题必定跨越学科界限

学科的发展事实上是应现实世界的变化而产生的，学科的分化也反映了我们对于现实世界的理解。任何学术研究都首先要面对现实世界里真实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用单一的学科来面对生活世界的问题又是远远不够的。现实问题永远是活泼的，自然是一个浑然的整体，生活本身并不需要或此或彼的划分。因此，现实问题必然是超越学科的，只要是来自现实世界的真实问题，一定是跨越学科范式的，这是我们自身的生活逻辑所决定的。所以说，要严肃地研究现实世界中的真实问题就必须跨学科，实现真正的学科联合与交叉。

我们现在提出的种种问题，实际上是对我们现有的学科状态提出质疑。面对这样的疑惑，首先要从心态上克服学科造成的藩篱。由于上述种种原因，以及我们现有教育体制缺乏通识教育的普及，在学科中普遍存在着各种傲慢与偏见，即便是在某些学科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非常可笑的“鄙

视链”。这其实是对人文学科内部的整体生态缺乏了解，由于现有教育体制的偏差，学者们往往固守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事实上，我们对于自身学科在当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也缺乏深刻的反思，缺乏对于学科边界的自我意识，因此在学科间就会存在这样一种傲慢与偏见。这种心态上的学科藩篱反过来会让我们远离现实世界中的真实问题。只有面对问题，反思学科，谦卑倾听，才能真正形成某种跨学科的研究氛围与路径。

### 努力克服学科藩篱，促进学术繁荣发展

学术研究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阶段，学术研究有不同的要求。我们应该更加尊重学科发展的规律，给大学的创新提供更大的空间，减少人为的干扰与影响。就大学自身而言，它应该创造出更大的空间，可以让学科有某种自由生长的土壤；同时就体制而言，应该在制度上为学科的跨越与交叉提供各种保障。例如，在芝加哥大学，跨学科研究与教学就非常成熟，在传统的学科体系之外，有很多跨学科的教育项目，如著名的“社会思想委员会”，它涉及哲学、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很多学科，在各种学科的缝隙中抓住很多真正的问题，来推进对这个世界的研究。芝加哥大学还有非常开放的学科心态，即便在文学系中做历史学的博士论文也没有问题，只要有坚实的指导团队就行。此外，它还有各种各样的平台来帮助学科之间建立这样或那样的交叉和勾连。这些活动单靠学者自身的自觉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一系列制度上的设计。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克服学科上的藩篱，面对问题来促进学科的交叉与融合。

此外，目前的学刊或者学科的栏目都比较学科化，或是哲学学科的，或是历史学科的，或是经济学的，应该有更多的学术刊物，坚持问题导向，坚持面对现实世界的真实问题，不回避矛盾，不回避挑战，面对现实问题，促进一种真正跨学科的学术研讨。



## 通识贯本末，守道弥断断

——技术时代如何突破学科壁垒

郑戈，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

现代学科体系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总体特征是化约主义、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学科各自专注一个特定的领域或方面，运用各自的方法去分析、运算和推理，从而在越来越小的范围内知道得越来越多。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思想家、百科全书的学者逐渐消失，在分工日益明确的现代知识生产系统中找不到任何位置。庄子哲学中关于“无用之用”的道理被忽视了，得以强调的是“庖丁解牛，技近乎道”，魏源进一步将其发挥为“技可近乎道，艺可通乎神”，强调专业技能和“工匠精神”，反对“大而无当”的人文素养与品位追求。这种专业化追求进而与现代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相配合，共同营造了功能分化、系统隔绝的现代社会构造。

理性主义的现代知识“事业”最终在科学、技术领域结出了硕果。但关于人和人类行为、人类组织、人类制度的知识体系已经完全为学科分工所分解，无法在整体性问题上为我们提供答案，甚至无法为我们寻求答案提供线索。人文学科逐渐变成培养私人品位的学科，很少能够介入公共政策和法律讨论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今天来讨论如何打破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藩篱”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了。但同时我们也看到，试图打破学科藩篱的努力是在和整个现代化过程最核心的知识生产机制作对，因此是困难重重的。然而，困难但有意义的智识努力正是值得有社会责任感、勇于担当的知识分子去承担的使命。但从“是否需要打破”到“如何打破”学科藩篱，需要考虑以下三方面的因素。

### 技术时代人类实践的本质

伦理学有一个经典的假设情境：假设一位没有子女的叔叔和作为他的唯一法定继承人的侄子一起航海

到了公海上。侄子对叔叔说：“您知道我是个好逸恶劳的人，只想整天打游戏。”叔叔说：“是的。”“您知道让我不劳而获地过上衣食无忧生活的最好办法是继承您的遗产。而这是以您的死亡为前提的。”“是的。”“您知道我们现在身



处渺无人迹的大海，海里有很多鲨鱼。我如果把您推下海，没有人会发现。”“是的。”“那我应该怎么做？”这位侄子前面的每一句话都是理性的事实判断，而最后一个问题则是一个应然问题。现代专业知识可以帮助人们在给定目的的前提下选择达致目的的最优手段，比如一位律师可以告诉这位青年他在何种情况下可以顺利继承叔叔的遗产，但没有哪位专家可以帮助他回答最后一个问题。在如今这个价值多元、诸神相争的世界，学科分工有效规避了人类实践中不得不面对的价值判断问题。就连专门研究“价值”问题的伦理学，也变成日益精细化的描述性的科学。如果这位侄子去咨询一位伦理学家，伦理学家会告诉他，有这样三种伦理学流派：一种是古典自由主义，它要求每一位采取某一行动的人都要考虑到自己的行动对其他“权利”主体的影响。侵害他人生命的行为，即使能够侥幸逃脱法律的制裁，在伦理上也是不正当的。其二是功利主义，它以





社会总体福利的增减作为衡量标准。你如果能以带来痛苦最小的方式结束你叔叔的生命，并且能够确保自己成功躲开法律惩罚，那就赶快下手吧。第三是社群主义或中国儒家哲学，它强调每个人都镶嵌在一定的社会角色之中，每一个社会角色都有相应的本分（或西塞罗所称的“职分”）。作为侄子，你负有“亲亲”“尊尊”的义务，不仅不应杀害你的叔父，还要尊重他、照顾他。

如今的科学技术应用场景已经把类似的决策困境以更复杂的形态呈现在世人面前。比如2018年11月曝光的贺建奎事件。媒体先是以完全正面的语气报道了这一事件，但随后的舆论反应却完全是负面的。《自然》杂志上一篇评论指出：“虽然贺建奎没有如愿以偿地获得鲜花和掌声，但没有人怀疑会有更多像他这样不择手段的人出现。这种技术非常简单；它的一些应用带来了惊人的结果；这样做引起的公共关注是无与伦比的。”科学适合于在给定目的的前提下寻求实现目的的最佳手段，但它本身无法帮助人们思考何种目的才是值得追求的。不幸的是，为工具理性所主导的社会科学在这个方面也自然科学一样越来越无能为力。贺建奎本人就是现代学科分工体制的典型产物。他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或许是个不错的专家，同时还是一个懂得利用自己的技术来赚钱的商人。这样的专家在今天这个时代是社会的主流。200多年前，英国小说家玛丽·雪莱创作了《弗兰肯斯坦》这部作品。小说的主角弗兰肯斯坦是一位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奋勇向前、不计后果的研究者。他用从停尸房和屠宰场中搜集的人类和动物的骨骼和器官拼接出了一个有生命的怪物。基因编辑技术已经使这种

怪物离我们越来越近，虽然这种技术的精巧性使得它所带来的成品不会像弗兰肯斯坦拼接出来的怪物那样具有外表惊悚性。要在这样一个时代将科技引向为人类造福的方向，而不是强化碎片化的认知和异化的人生，尤其需要打破学科藩篱。而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明确大学的定位，理顺科研与教育之间的关系。

### 打破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科藩篱， 需要理顺科研与教育的关系

人文社会科学是以人为研究和影响对象的学科。其中，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还有很大的区别，前者更多是从人的内在视角出发来理解人，其目的就是教育，是培养“三观”正确的“完人”。而后者则着力模仿自然科学，从外部视角出发来观察、理解和阐释各种外部刺激下人的行为。现代学科分工体系损害最深的是人文学科。2018年10月，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科院、中国工程院等五部门发出通知，联手开展清理“四唯”（即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的专项行动。然而，目前高等教育领域的绩效评估机制并没有给“反四唯”创造充足的条件，这会使得“反四唯”停留在口号层面。实际上，更重要的是要打破行政对科研的主导，给大学和科研单位更大的自主空间。

从事学术工作的人不仅有求生本能，也有求生技巧。如果影响一位大学教师前程的主要因素是看在何种刊物上发表了多少论文，那么，除了极少数超脱者之外，大部分人都会被引向只考虑发表技巧，不考虑真实问题和社会影响的方向。科研要求创新，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很多时候就意味着“剑走偏锋”。比如，你去研究李白、杜甫，前人已经研究透了，论文很难发表出来。但如果你去研究某个不知名的诗人，就很容易出成果。这和教育的需求是格格不入的。人文教育恰恰是需要借助一些经典文本来陶冶学生的品格、趣味和境界，追求的不是剑走偏锋，而是行大道，走正路。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许多人文学科而言，写书或许比发论文更能体现学者的水平，阐释经典的论著或许比“填补空白”的“原创性”作品更有公共价值。



正如自然科学领域的“前沿”研究离不开基础性的理论，人文社会科学也需要打好自身的基础。尤其是对人文学科而言，这个基础是人类文明经年积淀的产物，而不是一代人甚或一个人“创新”的产物。在如今价值多元、古今中西相争的时代背景下，寻找方向感的努力恰恰需要锚定在某种共同基础之上。实际上，对于根本问题的思考，并不存在那么大的冲突和矛盾。比如，你如果读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会发现它们和孔子、孟子、庄子的作品之间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的人还没有变得现代，没有学科分野，他们能够直面自然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去找寻人性的共同基础、伦理的共同基础。“通”的部分恰恰在于根基，而不是枝蔓，你想在枝蔓上打通是不可能的。

人文学科并不一定直接针对现代人的问题，比如卢梭的《爱弥儿》就是在鼓吹一种素朴的生活，它的基调是前现代的，对整个现代文明持一种批判的态度，更不要说孔、孟、庄、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前现代的经典作家，他们的作品并不直接针对当代人的处境，但我们却可以到里面去寻找解决当代问题的一些线索。

### 从通识教育的需求出发，实现科际整合

当然，实现科际整合并不是“开历史倒车”，无视社会分工和功能分化这一现代社会的基本事实。恰恰相反，这是对分工和专业化的一种纠偏和强化，也就是为之找到一个基础。否则，分工和专业化会导致小问题上的过度精明和大问题上的茫然无措，陷入列奥·施特劳斯所批判的那种“零售的理智，批发的疯狂”状态。“价值中立”的专业知识都是双刃剑，既可能服务于善的目的，也可能服务于恶的目的。人文学科和人文教育的目的是试图为人的社会生活找到某种共同的基础，使人格能够变得完整，从而解决工具理性过度膨胀导致的碎片化和异化问题。如果你回到人本身、生活本身、情感本身，会发现很多理论分析背后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抛开不同的学科背景，就会发现人类处理问题的心理机制其实也是比较类似

的，毕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相通的东西。笔者其实是用“通”来代替“同”。要找到一个大家都同意的、实体性的价值标准其实是比较困难的，但是如果回到问题本身，就会发现问题都是类似的，比如无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都要面对如何安顿身心的问题，这是单一的学科无法提供解决方案的问题。

中国是现代化道路上的后来者，自清末以来一直在紧追猛赶地学习早期工业化国家的现代技术文明，在压缩的时间里超速实现现代化。而如今，我们似乎可以稍微放缓一下脚步，思考一下中国文明能够为世界文明做出何种人文和制度层面的贡献。人文学科的主要功用在于提供教养，涵育文明，理应在中国的学术和高等教育中占有突出的一席之地。而我国目前的高等教育和科研机构的制度化建制可能不利于人文学科的发展。与美国相比，那里的顶尖大学非常重视没有短期效用的人文学科（比如古典学）的发展，此外还有大量的文理学院，不以就业为导向，侧重培养人的完备品格。将职业教育（如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安放到研究生层次。而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在研究型大学和职业培训式院校之间缺乏“文理学院”的建制，研究型大学虽然近年来也开始提倡“通识教育”，但师资主要是各门专业的老师，他/她们更受制于本专业的评价机制，通识只是副业。因此，理顺科研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改变以自然科学学术评价为模板的单一化评价标准，发展出适应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特点的评价机制，是打破学科藩篱，直面真实问题，并进而使中国学术具有更全面竞争力的制度性前提。



## ABSTRACT

### **Break Through Discipline Barriers: How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late to Reality in the Technological Era Yu Zhenhua & Zhu Guohua & Cheng Boqing & Zou Shipeng & Yang Yang & Sun Xiangchen & Zheng Ge**

**Abstract:** There are many signs that the Chines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is going to change dramatically. On the one h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T and the country's major strategy have put forward new propositions and new challenges for the study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on the other hand, the problems of the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re prominent and even have an increasing trend. To this end, we organized a round table on "How to Break Through the Discipline Barriers and Relate to Reality i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the experts discussed enthusiastically. Prof. Yu Zhenhua observed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s. He pointed out that i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cipline and interdisciplinary, body and use,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are well coordinated, then the humanities in the technological era will win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Prof. Zhu Guohua believes that there is still a huge gap in the level of human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If we do not recognize this, it will be the biggest crisis in the humanities. Prof. Cheng Boqing believes that academic levitation is common in Chinese social circles. Prof. Zou Shipeng pointed out that the transitional subdivision of disciplines and the complicated tendency of discipline system involve not only the stratific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but also the inertia and increasing interest factors formed over the years. It should be made i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organizational measures. Prof. Yang Yang pointed out that some professional colleges may weaken or even abandon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in order to pursue the evaluation of index data. We should take into account the inherent needs of national policy adjustment and education. Prof. Sun Xiangchen pointed out that academic research has its own development laws. We should respect the law of discipline development and reduce human interference and influence. Prof. Zheng Ge proposed some measures to break through discipline barriers and face up to real problems.

### **Global Imbalances, Trade War and New International Adjustment Mechanism Jan Kregel**

**Abstract:** There a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the existing trading system in two aspects. Firstly, finance has become the dominant force in trade, and enterprises seek the lowest cost production platform to maximize global production profits, contrary to the assumption of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Secondly, trade and production are carried out in a multilateral environment under the existing system, which reflects the existence of a global supply chain that dominates production in a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How can we design a trading system to avoid repeating the Japanese or Latin American problems of the past decades? Many countries hope to solve the imbalance through tariff adjustment mechanism. This is relatively easy for the trade of finished products, but when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finance are intermediate products unrelated to the trade of finished products, they may not produce the expected results. Once you understand the trade structure in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you will find that emphasizing bilateral imbalances is not only irrelevant, but also a misrepresentation of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ountries. In the current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 basic question to be determined is whether trade or finance leads to imbalances in the international current account. Tariffs have proven to be an inefficient solution, and it is time to consider adopting Keynes's proposal for an 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

**Keywords:** global imbalance; trade war; international adjustment; mechanism; 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

### **Continuous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in the Ten Year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John Lipsky**

**Abstract:** The global economy was brewing a crisis, and then suddenly there was a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Now the urgent question to answer is: are we ready for a new crisis? Based on the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f the measures taken after the last crisis and their effects,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post-crisis financial reform, the financial system needs more capital and capitalization, as well as more regulatory reforms. Balance sheet loopholes, asset valuation, emerging market capital flows, reserve buffers and liquidity, central liquidation stability and other issues must be fully taken into account.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mphasize that emergency liquidity in a crisis can give investors confidence. Liquidity initiatives should be institutionalized as a rule or a major tool.

**Keywords:** global economy;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IMF; G20; supervise; liquidity

### **Is Democracy Really in Crisis Jan-Werner Müller**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especially in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populism and extreme right wing political powers are obviously on the rise. This poses an unexpected new challenge to the usual optimistic

